

当代中国文论八讲

朱首献◎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外借

当代中国文论八讲

朱首献◎著

钱江新潮文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文论八讲/朱首献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203 - 2879 - 1

I. ①当… II. ①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6540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顺兰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75
插 页 2
字 数 309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总序

浙江大学是一所人文璀璨、名师荟萃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1897年创办的求是书院。百年浙大，一路风雨，一路辉煌。在这块深厚的土地上，它不仅哺育了马叙伦、马一浮、沈尹默、苏步青、王淦昌、贝时璋、张其昀、谈家桢、卢鹤绂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科学大师，而且在长期的办学中形成了堪称典范的求是精神。尤其是在竺可桢主政期间，于极其艰难的西迁办学中更是把这种“求是”精神发挥到极致，使浙大声名远播，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浙大中文系办学历史悠久。往远说，可追溯到林启主持的求是书院。办学伊始，书院即开设国文课程，先后延请宋恕、陈去病、马叙伦、沈尹默、张相等著名学者授业讲学——以此算起，中文系已历春秋百有十载；往近说，则源于1920年的之江大学国文系和1928年的国立浙江大学国文系——就此而言，中文系悠然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它前后历经西迁时期、龙泉分校时期，后又融合之江大学国文系、浙江大学国文系两大主脉。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文系被划归由浙大“母体”孵化出来的新的分支——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嗣后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组建的杭州大学合并，称杭州大学；从这时开始，浙大中文系便进入了“杭大中文系”时代，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杭大中文系”的系名，一叫便是整整四十年，并已在社会和学界赢得良好的声誉。直到1998年，原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中文系在经历了一番分分合合之后又返回到了它

的母体怀抱。现在的浙大中文系是以原杭大中文系为主体的，自然，它也整合了其他相关的师资力量。

浙大中文系建系以来，人才辈出，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祝文白、缪钺、刘大白、丰子恺、许钦文、夏承焘、姜亮夫、钱南场、胡士莹、徐声越、陆维钊、任铭善、王季思、郑奠、王驾吾、孙席珍、王西彦、蒋礼鸿、徐朔方等一大批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的杏坛名师、学术名流都曾于此任教。他们实践的“传承创造”的学术精神和追求的“卓然独立”的学术境界，为中文系的发展，包括有特色、有影响的学科的创建，也包括有特色、有发展后劲的梯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百年沧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的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回顾往昔，我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了竺可桢老校长在20世纪40年代所讲的这句话的深刻含意，也越发怀念为中文系发展做出贡献的诸多前辈和老师，并油然萌生了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拓宽和发展中文系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我们高兴地看到，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浙大中文系已发展成一个实力雄厚、在国内很具声誉和影响的系科。特别是自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基础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以来，更是在各个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在全国同类专业的高校排名中一直居于前列。中文系也由原先单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发展成为由汉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编辑出版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影视与动漫编导方向的立体多元、结构合理的“大中文”专业。目前，中文系已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以及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7个二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中国古典文献学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4个学科为浙江省省级重点学科。汉语史研究中心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现有在编教师50人，其中教授26人（博士生导师25人），副教授14人。他们不仅在各个学科发挥重要的带头和骨干作用，而且在国内学界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正是在这批以四五十岁

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学术核心的努力和引领下，由夏承焘、姜亮夫等前辈学者所开创的，吴熊和、王元骧等名师宿儒所光大的中文系学脉，方能做到承传有自、薪火绵延。

这次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钱江新潮文丛》，所收的是工作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的在职教师的系列学术论著。他们中有30多岁的学术新锐，也有五六十岁的年长或较年长一代学者。涉及的范围，包括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影视文学等不同学科。在这里，学科与学科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彼此是有差异的，思维理念也不尽一致，但有一点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在努力追求和体现中文系传统的“求是博雅”学风。章学诚评价古代两浙学风时曾谓：“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浙大中文系以“求是博雅”为系训，正是因为非求是则无以成专家，非博雅则无以成通儒。所谓“求是”，就是求真、求实；所谓“博雅”，就是求善、求美。这反映了我们力图贯通浙东西、融合古与今的学术视野与意识，以及从传统的学脉中创造新的浙江学派的愿望，也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学术观的一个投影和富有理性的特殊呈现。尽管面对浙大中文系的百年历史和悠久传统，本丛书中的这些成果尚远不能说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在这方面，我们深知与前辈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文系数十位教师用心血和智慧浇灌出来的这些学术之果，毕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求是博雅”作了新的诠释，这是很可欣喜的。可看作对中文系近十年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验，一次富有意味的“集体亮相”。

这些年，由于种种原因，学术浮躁和浮夸之风盛行，违反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的不端行为也屡有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中文系老师“守正创新”，一方面继承百年来的优良学术传统，不盲从、不浮躁，以“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严谨求实学风，孜孜不倦地潜心从事学术研究，坚守着学术正道；另一方面不囿陈说，锐意创新，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发现，为学术研究做出自己创造性的贡献，这十分难能可贵。而这一点，在这套丛书中也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不尚空谈，不发虚词，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崇尚事实为基础，强调学术研究的“实事求是”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我想，这就是

浙大中文系生生不息的学术传统，它贯穿百年而又存活于当下，已内化为我们的一种精神生命，一种支撑当下中文系存在和发展、坚守学术家园的“阿基米德点”。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弘扬浙大中文系这一学术传统，继往开来，进一步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建设，为提升和扩大其学术水平及影响尽一份绵薄之力。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中文系 1984 届校友、浙江通策集团董事局主席吕建明先生的鼎力相助。2007 年 5 月，在浙江大学 110 周年校庆期间，他慷慨捐资百万元支持中文学学科建设。他的善举和情意令人感佩，也催发了我们策划并编纂此书的积极性。源于此，我不仅对本丛书所反映的教师学术才华和追求感到欣慰，同时更对百年浙大中文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抱持一份坚定的信心。

钱潮天下奇观，故孙中山先生有“猛进如潮”之赞，学术创新，贵如潮水之猛进荡决；钱潮及期而信，故吴越王钱镠有“日夜波涛不暂息”之感，学脉传承，当如潮水之永不止息。“求是博雅”，就意味着学者既要有弄潮儿那般“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的锐气，也要有“晚来波静，海门飞上明月”的心境。本丛书以“钱江新潮”为名，其微意实在于此。

吴秀明

2009 年 4 月 15 日于浙江大学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讲 文艺活动论	7
第一节 文艺活动论的理论内核	8
第二节 对文艺活动论的批评	26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36
第二讲 文学人学论	42
第一节 “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出场、挫折与重返理论现场	43
第二节 文学人学本体论及其展开	58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75
第三讲 文学主体论	87
第一节 刘再复与文学主体论	88
第二节 主体论的误区与理论界的反拨	100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120
第四讲 理性与非理性主义文论	129
第一节 思想解放与非理性主义文论的滥觞	130
第二节 理性主义文论的回应与反拨	141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151
第五讲 本质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158
第一节 后现代文艺学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159
第二节 捍卫本质主义	173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187
第六讲 “重写文学史”论	193
第一节 重写文学史与审美主义文学史观	194
第二节 对“重写文学史”的质疑与批评	204
第三节 反思与评介	211
第七讲 文学史本体问题论	221
第一节 文化本体论	222
第二节 作品本体论	228
第三节 人性本体论	232
第四节 民族文化—心理本体论	241
第五节 读者本体论	247
第六节 对象（实体）本体论	254
第七节 反思与评介	259
第八讲 文学史方法问题论	270
第一节 客观论方法观	271
第二节 主观论方法观	280
第三节 调和论方法观	291
第四节 反思与评介	311
后 记	323

导 论

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不同，近代中国是在内忧外患之中进入 20 世纪的，与之相应的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至此亦开始酝酿一个大的转型。这正是吴趼人在《历史小说总序》中所言：“年来吾国上下，竞言变法，百度维新，教授之术，亦采法列强；教科之书，日新月异。”^① 中国文论的发展也被裹挟进这个过程，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方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学科的建构，揖别旧习学科研究理念，超越传统学术阈限，建构新的体系范畴，进而突破既有学科逻辑、知识结构、术语概念、导入方式、话语形态等的桎梏不断走向现代化、学科化、系统化。赖大仁曾认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文论历经了一条“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发展路径，所谓“破”，他认为，就是破除既往“文艺为政治服务”之类比较单一、僵化的理论模式，寻求文论观念的变革；所谓“引”，就是引进西方各种现代文论资源，拓宽理论视野获得启示借鉴；所谓“建”，就是在破除旧的理论观念和模式的同时，寻求新的理论观念与范式的重建。^② 他的这个归纳很有道理。其实，就 20 世纪中

① 吴趼人：《历史小说总序》，《月月小说》1906 年创刊号。

② 参见赖大仁《当代中国文论面临的问题及其理论反思》，《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国文论的整个流程来看，这个归纳也同样适用。20 世纪中国文论沿袭的也一样的是这样一个流程。只不过它要破除的是中国传统文论的禁锢，所引进的也同样是西方的各种文论资源，不过，它想建构的则是具有现代性和当代意识的中国新文论系统。就其具体呈现来看，这个过程尤以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为甚。在这样的一个“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历史流转中，作为与西方文论迥然相异、自成统系且具有显著的独立自主性和文化自洽性的中国传统文论不断地被超越、遮蔽，乃至边缘化、他者化，最终至于在某些文论叙事中被彻底悬置。在这种意义上，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论的失语问题，这自然不是惊人之论，而且，这种失语现象近乎是与 20 世纪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当代化进程成正比例的。

一方面求新，另一方面绝后，20 世纪中国文论与其传统性之间的这种血缘背离既造成其急于摆脱中国传统文论而在确立自身、建构自身上采取了急行冒进的策略，又使其由于失去传统的依据而与自身的历史脱节，进而陷入一种无根的焦灼，这种征象在 20 世纪中国文论走马灯似的理论迁移中均有体现。尤其是在 20 世纪前后期文学革命和解放思想这两次浪潮的旋涡中，中国文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学科重心，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漂移。整体上看，重新建构文学的本质、追问所谓的科学的文学研究方法、研讨文论学科的内部规律、建构科学的文论体系等几乎是 20 世纪中国文论发展的主题。这些主题不仅伴随了 20 世纪中国文论学科自草创到成熟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也深度地参与着 20 世纪中国文论思潮的更迭、演变，并成为其流传和迁移的内在推动之力。从 20 世纪伊始的社会进化论、经济基础决定论、机械反映论、主情论、人生论、人的文学论到其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论、阶级论、审美论、人学论、主体论、活动论、生产论、非理性主义文论、反本质主义文论、文化论、重写文学史及文学史的本体、方法论等，20 世纪的中国文论不断地实践着、重复着自己在理论立场上的调整和转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20 世纪中国文论一直在流转中嬗变，在嬗变中突围，在突围中寻找自己的理论归宿，在寻找自己的理论归宿中迷失方向。从积极意义上看，20 世纪中国文论一直在创新中游走，但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不断挑战知识的稳定性的各种理论实验最终其实导致了文论秩序上

的混乱。在总体性上，20 世纪的中国文论的这种嬗变在 7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的时间段中体现尤甚。虽然，时至今日，它们中的某些论见已经时过境迁，甚至也一直因为其鲜明的时代局限性饱受后学置喙，但是，无论非议如何，对其的研究和讨论则是非常必要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历史就不可能有现实，没有现实也不可能会有历史，更重要的是，中国文论的历史和现实已经如此，如果我们希望 21 世纪的中国文论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就必须认真对待 20 世纪中国文论的历史遗产，因此，研究当代中国文论思潮与流派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论的历史与当下，进而实现 21 世纪中国文论的学科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于本书及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文论，我们还需要说明的问题如下。

第一，本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为当代中国文论中的主要思潮，所以，“何谓思潮”需要我们在此做一简略的说明。就其具体的话语表现来看，思潮显然是一个被学界广为运用且流布甚远的范畴，但是，要清楚地说明这个熟识而又陌生的概念其实并非一件易事。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这个表述或许可资参照，他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相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①在此，我们暂不论梁启超的这个理解是否科学，但它至少道出了思潮形成的以下构成要件：其一，独思不成潮，一思潮之形成必有相当数量与规模的思考与之相呼应，必须得到社会层面的传播，也就是说，思潮非思想之个像，而是思想之群像；其二，思潮必为有一定价值之思考，且须与时代要求相适应，是特定时期时代要求的折射，所以，思潮往往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识性。在这种意义上，任何一个中国文论思潮的形成，首先应该引起当时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关注、参与、争鸣和讨论，具有一定的规模效应。其次，它必须是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的，反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映了当时一部分学人的文论思考，体现出文论发展中的时代征候和要求，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讲述对象时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的择取标准和理论尺度。

第二，20世纪中国文论从外部来看，是一体化的，其在逻辑运转上也基本具备一以贯之的特征。例如，有人提出的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一个符合20世纪中国文论逻辑运动上的统一性的范畴。不过，就其内部的共生形态来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内在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虽然每一个思潮都有着自己的理论诉求，而且这些诉求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深层次上，它们之间其实却是相互勾连，立体交织，难以完全进行有效的分割。例如，意识形态论与反映论虽然命名不一，但其在理论旨趣上却有着近乎共同的追求，而且，孤立二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会使另一方无从得到有效的阐释。文学主体论与文学本体论、文学人学论之间缠绕也是良多，如阎国忠就曾认为，“文学主体性问题的论争不是艺术本体问题的论争，但却隐含着和指向着艺术本体的思考”^①，更有学者甚至直接指出文学主体论就是“一种以人为文学本体的理论”^②。而主体论把人作为文学研究的思维中心，提倡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都要以人为本、为中心、为目的，既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同时也直接为文学人学论的最后一阶段的讨论开辟了致思向度。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不仅与人性论、方法论有着多重交织，而且同主体论也有不少的纠葛，如重写文学史讨论的开启者之一王晓明就指出，“其实‘重写文学史’背后有一个‘主体性’的问题”^③。文学史的本体问题又与文学人学、文化诗学等盘根错节。非理性主义文论则与文学人学论、文学本体论、艺术活动论等之间有着太多的交集。文学史本体论与方法论乃至重写文学史之间也是有着多重的交织与连横。如此等等，均表明20世纪中国文论内在肌理的错综性和逻辑进路的曲折和复杂性，所以，要真正勾画20世纪中国文论的内在脉络的清晰化的显像，自然绝非一件容易的事。

① 阎国忠：《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② 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6期。

③ 王晓明、杨庆祥：《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

第三，本书既为研究当代中国文论思潮，其研究的对象当然是集中在与现代相区别而言的当代文论领域，但是，何为当代，这也是一个无法说清楚的问题。通常，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般以 1949 年这个政治学的地标为界限，此前归于现代，此后则属当代。这种区分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其缺陷在于不仅撕裂了文学发展的整一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以突出文学对政治的过度依附为指针的，这自然会造成对文学自身的品性的无视。在文论研究中，模仿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这种分期做法的观点也时有所见。不过文论界也有学者是从中国文论的性质上来理解当代问题的。如像杨春时认为的那样，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文论只不过是仍然行进在现代性路途中的文论，尚处在前现代状态，所以，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尚且要假以时日，讨论其当代性显然还为时过早。杨春时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否定中国当代文论的观点。此外，基于对上述政治标准第一的分割方法的反拨，文论界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真正的当代应当自改革开放始，因为只有到此时，中国文论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有一个深刻的反思，中国文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才走向真正的自觉。在此，我们也打算扬弃以 1949 年为标界这个通常的做法，而从文论的自觉性出发来对中国文论的当代性进行界定，在这种界定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论的逻辑起点是在意味着中国政治思想解放的 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个远在 1949 年后面的时间节点上，正是如此，我们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新时期的中国文论。

第四，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国内出版的一些重要的研究当代中国文论的著述中，不少研究者都将研究视域主要集中于对狭义的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文学史理论的问题则多有忽略，这实际上是很不正常的。党圣元在《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一文中就曾这样指出，“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自觉而独立的学科，虽然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而且在观念和方法方面取得了极大的进步，积累了大量的思想资源，但是关于本学科的理论模式也就是‘文学史理论’或曰‘文学史学’的研究和探讨却一直开展得不够。过去，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很少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各种文学概论或文学理论著作或教科书中鲜有专门讲述文学史理论的章节，则说明文学史理论在文学理论

研究中尚不能成为一个‘问题’。由于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学史学缺乏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所以至今我们还没有一种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文学史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文学史学日益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包括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两个领域的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讨论，尤其是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开始有人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另外，我们也不得不指出，截至目前，这一讨论主要集中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论两个方面，然而我们知道文学史理论或曰文学史学的义界并不仅仅包含观念与方法这两个方面，其内涵除此二者之外还有许多。如果这种研究讨论仅停留在观念和方法论的范围之内，那么便不可能达到对文学史理论本体进行全面观照的理论学术层面。文学史理论所指述的对象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就其性质而言，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的范畴。”^① 而在新近发表的《论文学史本体》中，党圣元又重申，“以往，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很少关注文学史理论问题，在各种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以及其他文学理论著作中，鲜有专门讲述文学史理论的章节，则表明文学史理论在以往的文学理论研究中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②。我们非常赞同党圣元的观点，文学史理论应该而且也必须进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来，这不仅对文学史理论本身的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就是对文论自身的完善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把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关于中国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也纳入当代中国文论思潮的论域中来。实际上，文学史理论或问题的论争并非仅是文学史学科的问题，它必然会延伸到文学理论乃至哲学、史学等学科，当然，在学科壁垒不断强化的今天，这种做法是否会得到学界认可，我们尚存疑虑，也有待于学界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但我们的主要意图是在引起文论研究者对文学史理论问题的关注和参与。

① 党圣元：《新世纪文学史理论研究的格局、问题意识及方法范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② 党圣元：《论文学史本体》，《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第一讲

文艺活动论

20 世纪文论思潮中，文艺活动论是理论界继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主体论及艺术生产论诸论之后对于文艺本质研究所展开的另一新维度。王元骧先生曾将之与审美反映论、艺术生产论并列，视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派别之一，其在当代中国文论思潮中的重要性及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王元骧先生还断言，“虽然文艺活动论迄今还少有系统的著作，影响似乎也不及审美反映论和艺术生产论，但它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兴趣，并显示出它富有生机的理论魅力”^①。他的这个判断也是极其敏锐的，可以说是准确把握住了文艺活动论的内在理论张力。从总体理论倾向上看，文艺活动论核心的理论诉求就是主张立足于从事着感性实践活动的人、从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出发，用活动的观点来理解文学艺术的本质，并反对以往那种对文艺本质的静止、抽象、形而上的探讨，主张将文艺现象与人活生生的生存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而且，在对文学艺术本体的认知上，文艺活动论认为文艺的真正本体是人的感性存在及其审美实践活动。在当代中国文论思潮的历史上，文艺活动论滥觞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并迁延至 90 年代初，虽然其在持续时间上不若其他的文论思潮，如审美反映论等，

^① 王元骧：《文艺活动论评析》，《文史哲》2001 年第 1 期。

但是，其对于文学本质的一些全新的理解却在极短的时间内开拓了中国文论界的文学艺术观念，丰富了人们的理论想象，从而将学界对文艺本质的体认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节 文艺活动论的理论内核

在参与文艺活动论思潮的文论家中，蒋培坤、童庆炳、杜书瀛、陈传才、林兴宅、彭富春、扬子江等是其中较为有建树的代表。现在，盘点文艺活动论的一系列理论诉求和主张，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这一思潮中不仅包含了诸多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文论建构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有效启示，而且也包含诸多对我们实施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极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首先，文艺活动论者认为新的艺术本体论应该以人的感性存在及其审美实践活动为本体。198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上，蒋培坤发表了《从人的自由生命表现看人类的艺术活动》一文，他认为，过去我们对文艺的定义“确实很难令人满意”，无论说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还是说文艺是客观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等，“这类定义似乎说明了文艺的一切，但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说明”。他指出，我们把文学艺术看作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看作“认识和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这是对文艺所做的哲学规定。这种规定当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指出，其有着“明显的而且是带根本性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它不是把人类的艺术活动看作“人这个实践主体所特有的感性生命活动”，看作“人通过全面的方式使自身对象化并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身的活动”，而仅仅把艺术看作“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企图把文艺问题的解决仅仅局限在认识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批判过一切旧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对事物、现实、感性，往往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他提出，我们在探讨文艺问题时，同样不能忘记马克思的这个重要思想。这就是